

民国诗学论著丛刊

叶嘉莹 主编 陈斐 执行主编

曾迺敦 著

中國女詞人

陈丽丽 整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民 国 诗 学 论 著 丛 刊

叶嘉莹 主编

陈斐 执行主编

中國女詞人

曾迺敦 著
陈丽丽 整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词人 / 曾迺敦著; 陈丽丽整理.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7. 8

(民国诗学论著丛刊 / 叶嘉莹主编, 陈斐执行主编)

ISBN 978-7-5039-6275-2

I. ①中… II. ①曾… ②陈… III. ①女作家—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1769 号

中国女词人

(民国诗学论著丛刊)

主 编 叶嘉莹

执行主编 陈 斐

著 者 曾迺敦

整 理 者 陈丽丽

丛书统筹 陶 玮

责任编辑 胡 晋 赵 月

版式设计 顾 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6—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8.75

字 数 166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书 号 ISBN 978-7-5039-6275-2

定 价 45.00 元

本丛刊个别作者未能取得联系, 请相关人士尽快与我社联系办理版权事宜。

联系电话: (010) 84057672 (010) 84057604

整理说明

一、本丛刊抱着“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以通途”的宗旨，主要选刊民国时期（1912—1949）成书的、学术价值或普及价值较高的、与诗词曲等广义的古典诗歌相关的论著。少数与诗歌密切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或成书于晚清的有价值的此类著作，以及同时期相关的汉学著作，亦适当收录。诗话、词话及新诗研究论著等，因为已有相关大型文献资料集出版或列入出版计划，故暂且不予收录。

二、本丛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期望较为全面地呈现民国诗学研究的多元气象；按照撰著内容和体例，大致分为“史论编”“法度编”“选注编”等编，分辑滚动推出，每编每辑十种左右；优先选刊1949年以后没有整理出版过的著作，以节约出版资源。

三、每部拟刊论著，我们都约请相关专家进行整理，并在前面撰写一篇“导读”，介绍该著的作者生平、成书经过、学术背景、主要观点、诗学价值、社会影响等，以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

四、整理时，以原著内容最全、文字最精的版本为底本，

参校其他版本（如手稿本、期刊连载版等）和相关书籍，修订原版讹误，参照古籍整理规范出校勘记。校勘一般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误脱衍倒”者，皆据他本或他书订正，并出校记。引文与所引著作之通行本文字不同者，只要文意顺畅，亦读得通，一般不改动原文、不出校记。显著的版刻错误，如笔画讹误、不见字书者，或“日曰”“末未”“己巳巳”“戊戌戌”混同之类，如果根据上下文足以断定是非，一律径改，不出校记。注文中的魏妥玛注音，统一改为现代汉语拼音，但不出校记。为避烦琐，校记中征引他书，仅注明书名及页码，卷末另附“本次整理征引文献”，详列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等信息。

五、原版为繁体竖排，现统一改为简体横排，并参照最新版国标《标点符号用法》及古籍整理规范加以新式标点。繁体字、异体字一般改为规范的简体字；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通假字或民国时期特有的虚词（如“底”）等，则保留原貌。因版式改动，原版行文中提到的“右文”“如左”“左表”等，统改为“上文”“如下”“下表”等。

六、一些论著提到的外国人名、地名、书名等，译法与今日或有不同，为保存原貌，不作改动。个别论著的极少数提法，或有一定时代局限性，为保存原貌，亦不作删改，望读者鉴之。

七、我们的整理目标是争取形成可以传世的、雅俗共赏的“新定本”，但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尽管我们僉勉从事，或疏漏在所难免，恳请方家赐正。

总序

1912年清帝逊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般称为民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政局不稳、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但思想、学术、文化却自由活跃、异彩纷呈。主编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刘梦溪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在后‘五四’时期所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繁盛期和高峰期。而当时的一批大师巨子……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后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相比肩了。”^[1]

的确，民国学人撰写的学术论著，虽然限于物质条件和学科发展水平，有些知识需要更新，有些观点有待商榷，有些论述还要深化……但仍然接续、充盈着中国固有学术的人文义脉和精魂，更具有为国家民族谋求出路、积极参与当前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怀，更具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打通文史哲、将创

[1]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3—124页。

作和研究相结合的开阔视野和博通气象，更具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的传世期许和实事求是、惜墨如金的朴茂之风。这在人文学术研究显现出“技术化”“边缘化”“碎片化”“泡沫化”等不良倾向的今天，颇有借鉴意义。而且，那时的不少论著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本框架，不管就论析之精辟还是与史实之契合而言，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主编蒋寅先生即深有感触地说：“最近为撰写关于本世纪中国诗学研究史的论文，我读了一批民国年间的学术著作。我很惊异，在半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已将某些领域（比如汉魏六朝诗歌）的研究做到那么深的境地。虽然著作不太多，却很充实。相比之下，80年代以来的研究，实际的成果积累与文献的数量远不成比例。满目充斥的商业性写作和哗众取宠的、投机取巧的著作，就不必谈了，即使是真诚的研究——姑且称之研究吧，也存在着极其庸滥的情形。从浅的层次说，是无规则操作，无视他人的研究，自说自话，造成大量的低层次重复。从深层次说，是完全缺乏知识积累的基本学术理念……许多论著不是要研究问题，增加知识，而是没有问题，卖弄常识。”^[1]

陈寅恪先生曾将佛学刺激、影响下新儒学之产生、传衍看作秦以后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缘”^[2]。近代以来的大事因缘，

[1] 蒋寅：《热闹过后的审视》，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2] 参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82页。

无疑是在西学的刺激、影响下发展本土学术。中国传统学术需要外来学说、理论的刺激与拓展，既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惠赐的绝佳良机。中华民族一向不善于推理思辨，更看重文学的实用价值、追求纵情直观的欣赏。中国语文亦单体独文、组词成句时颇富颠倒错综之美。而且，古代书写、版刻相对比较困难，文人往往集评论者、研究者、作者、读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彼此间具有“共同的阅读背景、表达习惯、思维方式、感受联想”^[1]等等。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觉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诗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不是整体式的”^[2]。反映在著述形态中，便是多从经验、印象出发，以诗话、序跋、评点、笔记、札记等相对零碎的形式呈现，带有笼统性和随意性，缺乏实证性和系统性。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在西学的熏沐、刺激下憬然而醒，积极汲取西方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胡适、傅斯年等民国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旋律鼓动下，掀起蓬蓬勃勃的“新文化运动”，更加全面地引入西方理论、观念、方法、话语等，按照各自的理解和方式应用在“整理国故”实践中，在西学的参照下重建起现代学术。此后中国学术的发展，大体是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拓展、深化。

[1]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2] 同上书，第111页。

民国学人的开辟、奠基之功，可谓大矣！

中华民族素来以“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郭象注《庄子·天运》语）的观点看待历史和当下的关系。^[1]我们生逢今日之世，接续传统、回应西学，实为需要承担的一体两面之重任，缺一不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继承，就没有东西和别人交流，永远趴在地上拾人遗穗，甚或没有鉴别力，将“洋垃圾”当“珍宝”供奉；而故步自封、无视西学，又会错失时代赋予我们的创新良机，治学难以“预流”。^[2]相对而言，经历了百余年欧风美雨的冲刷和众所周知的劫难之后，如何接续传统越来越成了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携手，大量译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和海外汉学研究论著，如影响颇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皆有数百种之多。这些论著的译介，于本土人文学术研究开拓视域、更新方法等功不可没，但同时，学界也仿佛患了“失语症”，出现一味模仿海外汉学风格的不良倾向。“只要西方思想

[1] 参见刘家和《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2] 这里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陈先生治学，有强烈的“预流”意识，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

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人“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1]。这种模仿或套用，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和论题选择上，有时甚或反映在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中。有学者将这称为“汉学心态”，提到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的高度予以批判。^[2]在此背景下，自言“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的费孝通先生，晚年阅读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前辈的著作，敏锐思考和回应信息交流愈来愈便捷的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转型的挑战，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个获得广泛共鸣的议题，呼吁当下最紧迫的是培养“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3]。学术是文化的核心，“学术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所在。近年哲学界“中国哲学合法性”、文学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美术界“构建中国美术观”等讨论颇热的话题，皆可看作本土“学术自觉”的表征，共同汇聚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时代命题。^[4]站在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民国学人的论著无疑可以给我们带来丰

[1]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余英时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5页。

[2] 参见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顾明栋《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文。

[3]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4] 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富的启示。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西思想文化、旧学新知碰撞、交融发生的“化合”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既有固守传统观念、家数者，也有采用新观念、新方法者，还有似新却旧、似旧还新、新旧间杂者……只不过长期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我们对这段学术史的梳理、回顾往往彰显、肯定的是那些和西学类似的论著及面相。然而，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理论创新能力成为时代命题的崭新历史条件下，恰恰是那些被遮蔽的论著及面相，更具有参考价值。因为治学如积薪，以对西学的理解、借用而言，我们已后来居上，倒是这些论著在古今中西的通观视域中，坚守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汲取西方学术优长，进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尝试和努力，长期以来被以“保守”“落后”的判词给予了冷眼、否定，今天值得换一种眼光、花点工夫好好提炼、总结，因为这正是我们构建中华自身学术体系的可能萌蘖。诗学研究因为与创作体验、母语特性、民族心理、文化基因等关系更为密切，这方面的借鉴意义显得尤其迫切、突出。

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几年，喜欢欣赏、创作诗词的朋友在逐渐增多，中小学加大了诗词教学比重，《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3日）》亦强调“做好古籍整理、经典出版、义理阐释、社会普及工作”，加强对

中华诗词出版物的扶持。^[1]全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诗词之于陶冶情操、净化风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诗词传承面临的严峻形势。毋庸讳言，当下诗词氛围已十分稀薄，能够切理赅心、鞭辟入里地解说诗词或将诗词写得地道的人非常罕见。大多数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已不再创作，现行评价、考核体系要求于他们的，不过是从外部审视、抽绎出种种文学史知识，这很难说能触及中华诗词的真血脉、真精魂。在此情势下，与其组织人马“炮制”一些隔靴搔痒、搬来搬去的“新著”，不如将传统文化氛围还很浓郁、诗词仍以“活态”传承着的民国时期诞生的有价值的论著重新整理出版：一方面，使饱含着先辈心血的精金美玉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另一方面，也使当下喜欢诗词的朋友得识门径，由此解悟。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艺术都有一定的规则、法度，中华诗词的欣赏、创作亦然。初学者尤其需要通过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入门书籍指引，掌握规则、法度。然而，又没有万能之法，“在丰富生动的创作实践中，任何‘法’都会有失灵的时候；面对浩如烟海的作品，任何‘法’都会有反例存在”^[2]。由“法”达到对“法”的超越，进而“以无法为法”（纪昀《唐人试律说·序》），“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3日）》，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0日。

[2] 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无用法之迹，而法自行乎其中”（李锜《诗法易简录》），才是中华诗词欣赏、创作的向上之路，希望大家于此措意焉。

近年来，随着逐渐升温的“国学热”“民国热”，诸家出版社纷纷重版民国国学研究著作，陆续推出了不少丛书，如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北斗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大师国学馆”、岳麓书社的“民国学术文化名著”、知识产权出版社的“民国文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丛书”等。这些丛书虽然也涉及了诗学论著，但往往是王国维《人间词话》、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吴梅《词学通论》等少数几部。其实，还有很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普及价值的民国诗学论著，1949年以后从来没有点校重版过。最近几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文学研究丛书”“民国诗歌史著集成”“民国诗词作法丛书”“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等丛刊，虽然较为集中地收录了民国诗学研究某一体式或某一领域的论著，但或影印或繁体重排，都没有校勘记，且大多不零售，定价普遍较高，虽有功学界，然不便普及。有鉴于此，我们拟选编整理一套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的诗学专题文献库——“民国诗学论著丛刊”，以推动中华诗词的研究、创作和普及。

我们这次整理“民国诗学论著丛刊”，抱着“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以通途”的宗旨，在扎实、详细的书目调查的基础上，主要选刊民国时期成书的与诗、词、曲等广义的古典诗歌

相关的论著。在理论、观念、方法、话语乃至撰著形态、体例等方面，则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古今中西兼收并蓄，以较为全面地呈现民国诗学研究的多元气象和立体景观。在实际操作中，大致按照撰著内容和体例，分为“史论编”“法度编”“选注编”等编，分辑滚动推出。“史论编”主要选刊诗学史论著作，如梁昆《宋诗派别论》、宛敏灏《二晏及其词》等；“法度编”主要选刊谈论、介绍诗词创作法度、门径的书籍，如顾佛影《填词百法》、顾实《诗法捷要》等；“选注编”重刊有价值的诗歌选本或注本，重要者加以校注、赏析。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分类。民国学人往往能够将创作和研究相结合，他们撰写的不少史论著作亦有介绍作法的内容，不少讲解法度的书籍亦会涉及史论，我们不过根据内容偏重及著作题名权宜区分罢了。诗话、词话及新诗研究论著等，因为已有“民国诗话丛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等大型文献资料集出版或列入出版计划，故暂且不予收录。

每部拟刊的论著，我们都约请在该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功底扎实、学风谨严的中青年学者进行整理，并在前面撰写“导读”，以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整理时，我们征询专家意见，制定了详密的工作细则，既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又参照古籍整理规范出严格的校勘记，争取形成可以传世的、雅俗共赏的“新定本”。版式、用纸、装帧等方面，则发扬讲究细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提高阅读率为标的，处处流露

着为读者考虑的温情。这些看似小事，实则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国民素养的提升。资深出版人、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就曾指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现在很多出版社和书店都喜欢出版、销售大部头、豪华版的书，这些书定价高，消耗的纸浆和能源也多，但手里拿不动，不便于阅读和随身携带，对阅读率有负面影响。^[1]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读者朋友在节奏紧张、时间零碎的现代社会里的阅读需求，所收论著都是内容充实、装帧便携的“贵金属”，人们在地铁上、候车时、临睡前、旅途之中、工作之余、休闲之刻……都可以顺手翻上几页，随时接受中华诗词的浸润，从而切切实实地提高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接续诗词命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营建“书香社会”略尽绵薄。

总之，精到稀见的选目、中肯解颐的导读、专业严谨的整理、美观大方的装帧，是我们的“民国诗学论著丛刊”为坊间类似丛书不可替代的鲜明特色及核心竞争力所在。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杨斌、郝庆军、陶玮等领导与编辑们的大力支持，让我们酝酿多年的设想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得到近乎理想的实现。从会议结束后的偶遇交谈到正式签订出版合同，不到一周时间，这种一拍即合的灵犀相通亦堪称一段佳话。感谢众多专家、学者的耐心指导和辛勤耕耘！正是共同的发扬、传承中华诗词的

[1] 参见李小龙《丹铅绚烂焕文章——程毅中编审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这套丛刊，由此领略中华诗词之美；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为我们出谋划策或加入我们的整理团队，一起呵护好这项功德无量的出版工程，让千载不磨之诗心在我们和后辈的生命中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发！

葉嘉莹 陈斐

2016年10月28日草稿

2016年11月1日修订

导读

从断代角度来观照词史发展，1912—1949年间，可以说是时间跨度最小的一个阶段。这短短的38年，正是封建社会终结到新中国成立的交接点。尽管战争、动荡贯穿始终，但文化与学术之光并没有被战火湮没，一些颇有影响的学者和著述依然在词史长河中飞扬起一朵朵浪花。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十多年间，词坛活动十分丰富：吴梅、刘毓盘、叶恭绰等传统词人在新式大学中任教；卢冀野、唐圭璋、龙榆生、夏承焘等新一代词学家登上词坛；词社、词学教学、词学研究组织、词学刊物等纷纷展开；《青鹤》《词学季刊》等逐渐成为词学重地。

这一时期的词学，既有对晚清四大家所代表的传统理论的继承，又有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一些学者把进化论等思想引入词学研究中，产生了一批与传统词话迥然不同的词史类著作，比如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国词史大纲》，刘毓盘的《词史》，寿铤的《词学讲义》等，成为词学研究的闪光点。在民国词史著作中，曾迺敦先生的《中国女词人》，可以说是一部富有时代色彩的专题性词史。